

我为什么要写 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

□王定钧



10年。这10年，不仅有进步电影人同“满映”反动分子的斗争，也有跟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持续抗争，这并非两段割裂的历史，而是一场前后相承的斗争过程。从东影的“建立”，到被迫“北撤”，再到极端艰难条件下的重新“创业”，这条历史脉络，是新中国电影完成“从生存到建制”转变的关键时期，构成了共和国电影事业真正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因此，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所书写的，并不仅是某一家电影厂的厂史，而是通过长影这一具体而独特的样本，呈现中国电影从战时体制向新中国电影体制转型的真实过程。

这段历史，几乎被时间掩埋，却深刻塑造了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品格，影响着中国电影血脉的传承。补写这一段历史空白，是长期在长影工作的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然而，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、鲜活的面孔、惊心动魄的抉择，正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而逐渐模糊。如果不能在记忆尚存之时将它们记录下来，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很可能会永久消逝。

我曾前往鹤岗市，也就是兴山采访。最终只找到几张东影照片电子版，东影原址仅留存几块黑色大理石石碑。我向当地人询问，许多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新中国电影的初生地。

正因如此，我写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，更是为了抢救一段行将模糊的创业史诗，让人们记住东影的辉煌时光。我们既需要《新中国电影摇篮》那样厚重的正史，也需要《长影的故事》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这样具象而有温度的纪实作为补充，让正史中的事件和姓名重新变得鲜活。

因此，于我而言，这次写作不仅是一项任务，更是一份承载着时间意义的责任。从更深层面来看，这是一种对中国电影“精神丰碑”的凝望——既是向新中国电影开拓者的致敬，也是对电影文化源头的回望。

只有真正理解东影这10年的历史，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电影从何处出发，最初的理想、信念与初心是什么。我所试图探寻的，是那支撑起无数经典作品的“东影魂”——一种由理想、勇气、才华与奉献精神共同构成的精神力量。这种精神，对今天乃至未来的电影创作，仍具有现实而持久的激励意义。

2025年，是长影建厂80周年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，我重新审视了“满映”这一问题。

伪满洲国建立不久，日本关东军便着手策划建立电影机构，并在1937年动工修建“满映”第二任理事长甘粕正彦，直接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，曾任伪满洲国警察厅第一任厅长。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：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是军事侵略，而建立电影厂，则是其实施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妄图用武力控制中国人民的肉体，以影像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，用文化配合战争。

但遗憾的是，今天的年轻人中，知道伪满洲国、了解“满映”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甚至连东影这一名称，也逐渐淡出公共记忆。正因如此，我认为对“满映”的书写，不只是学术需求，更是历史责任。关于“满映”的系统研究本就不多，如果这些即将消失的史实无人记录，它们很可能会彻底淹没在这些历史的长河中。

我书写这段历史，只是为了永不忘却，为了更清醒、更坚定地前行。



以“爱己”之名

□孙艺凌

近日，有关全国两会的精彩报道备受瞩目，很多值得深思的话题引发读者热议。其中，一段采访蒙曼老师的短视频最令我触动。关于“爱你老己”这个一度封神的网络热词，蒙曼老师作了如下解读：“爱你老己”，首先是接纳自己，另外，让自己永远在成长。“爱你老己”不是给自己吃什么、穿什么、戴什么，而是真正地成为自己，让自己有资格成为心目中那个自己，这才是爱自己最好的形式。

“爱你老己”，简单的四个字，却戳中了无数在生活中奔忙的人。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，我想很多女性都和我一样，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。还未从生育的疼痛中清醒，就迷迷糊糊地扛起了哺育孩子的义务。以生育为界限，被动地一夜成熟，猝然开启了白天手忙脚乱，晚上夜夜难眠的日子。生活被无边无际的琐碎扯得七零八落，一次次在夜深人静时暗自流泪，又默默在天亮前拭干泪痕，强行自愈，重新做回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

从自由如风的女儿到时刻被婴孩捆绑的母亲，从读书看电影逛街到喂奶拍嗝洗尿布，生活画风的突变堪称翻天覆地。无处宣泄的压力转化为高涨的食欲，暴饮暴食一度让我的体重飙到160斤。虽然时隔6年，但读到这句“爱你老己”，依然被深深打动，不由得心疼起曾经徘徊谷底的那个自己。“爱你老己，谢谢你那么坚强，不离不弃陪我走过最难的时光”。

有人说，自己是疲惫时犒劳自己的一顿大餐，是难题解决后奖励自己的一件心仪礼物，是任性而为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……可是吃完大餐、拆完礼物、旅行回来，就不爱“老己”了吗？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宝贵，却很少知道怎么去爱生命，爱“老己”。

曾经刷到一位育儿博主的一段话，令我深受启发。他说：“千万别让孩子学不学无所谓，健康快乐就行。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支撑起来的。学习和快乐并不对立，别人都会就咱孩子不会，孩子就很难快乐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，那才是真正的痛苦。课堂有参与感、考试做作业有胜任感、集体中有认同感，这些都是孩子快乐的源泉。躺平并不能获得快乐，努力才能获得快乐。”

其实，人生皆如此，快乐、幸福、健康这些我们向往的美好，从不会凭空得来，而是奋斗出来的。饥肠辘辘时的饭菜最可口，辛劳后的休憩最惬意，千辛万苦取得的成就最可贵。真正的爱自己，不是躺平，而是遇到波折也不放弃自己，在谷底也要开花；可以在奔波中自嘲为生活的“牛马”，但要记住，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爱自己，要允许自己不断进步，悄悄努力慢慢出众，让“老己”有机会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结识更优秀的人才。

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完善自我的旅程。人终其一生都在感受、体悟，真正的成长不在年龄，而在于认知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，“爱你老己”也一样。“爱己”如养花，不在一朝一夕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精心培育，待你盛开蝴蝶自来。那些不起眼的进步，那些咬着牙的坚持，都在为他日的一飞冲天默默积攒着力量。

光阴似箭，在这盛衰无常又何其短暂的一生，每一天都不可辜负，每一个独一无二的“我”都值得被爱，要保持快乐，要向上生长，要闪闪发光。花有重开时，人无再少年。于是，有了朱自清先生的感兴之作《匆匆》，也有了那一句直击人心的拷问：“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”在这无法重来的一生中，我们能做的，唯有珍爱自己，珍惜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，追风赶月莫停留，前路漫漫亦灿灿。人生苦短，你都是平凡却诗意的英雄，在未知又有限的生命里，时常迷茫，时常悲伤，但从未放弃过前行的念头，勇敢又坚定地往前走……三毛说，“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，待明白过来时，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”。爱自己，无论何时开始都不晚。

多庆幸，人生这趟旅程你都有“老己”相伴。以“爱己”之名，赴时光之约，在成长的路上，稳稳走，深深爱，不负自己，不负余生。“爱你老己”。

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年、长影建厂80周年的日子里，100万字的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我为什么要写“长影往事”，而且还是“三部曲”呢？

长影，曾经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空间。在尚未开发旅游的年代，它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是最为神秘、最希望去参观的一个地方，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频次极高的电影厂。这便是长影的魅力所在。这种长期而广泛的关注，奠定了长影在中国电影史中的独特地位。

正因为如此，长影的80多年历史中，有太多值得被认真书写、系统呈现的内容。

我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就进入长影工作，直至退休，亲历并见证了长影的多个历史阶段。1986年，应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之邀，我采访了浦克、王启民、尹升山、苏里、袁乃晨等多位老艺术家，相关文字陆续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中，成为后来研究“满映”、东影的重要史料来源。我也曾作为电影界唯一编委，参与长春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工作，东影史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写作三部曲的过程中，著名导演李前宽提出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设想。于是，我们一起采访多位东影老艺术家、老领导的后人，创作了再现这段历史的电影剧本《东方欲晓》。可惜的是，由于疫情突发、李导病逝，这部作品未能搬上银幕，留下了诸多遗憾。

我先后在长影担任剧本编辑、文学部主任、艺术处处长、艺委会秘书长，同时兼任吉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，与许多老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这些工作与实践，使我觉得以系统梳理“满映”、东影与新中国电影体制之间的历史关联。这为我完成《长影往事三部曲》奠定了坚实的史料与实践基础。

重新回望中国电影史，并不只是为了纪念而纪念，更是为了重新确认电影在中国现代文化结构中的生成路径。新中国电影，是在战争、革命与制度重构等高度压缩、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电影并非在稳定的工业体系中自然生长，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历史环境中，由电影开拓者们拼搏抗争、逐渐建立起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长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亮点。

我之所以将三部曲时间范围限定在1945年至1955年，是因为这是长影历史中最动荡、最能考验人的10年。

这是我党从无到有创建第一个电影基地的10年；是在光明与黑暗、进步与反动，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，东影面临生死存亡、艰苦创业的10年；也是东影实行军管、紧急北撤，在兴山重新起步，并迅速创造第一个辉煌的

要为人间唱情长

——话剧《唱唱儿》创作谈
□高媛



的高明之处。不管那舞台是田间地头，还是场院炕头。“千军万马，全靠咱俩”是何等骄傲的担当，又是何等悲凉的自信。一尺方圆，两个人，就能演出一个世界的亘古乾坤。

但也正是低成本的演出方式和低门槛的观演环境，令这些飘零江湖的艺人有了活路。为了活着乃至活得更好，修炼出极致的技艺，唱说扮舞，四功一绝，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技艺与老戏儿，让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尊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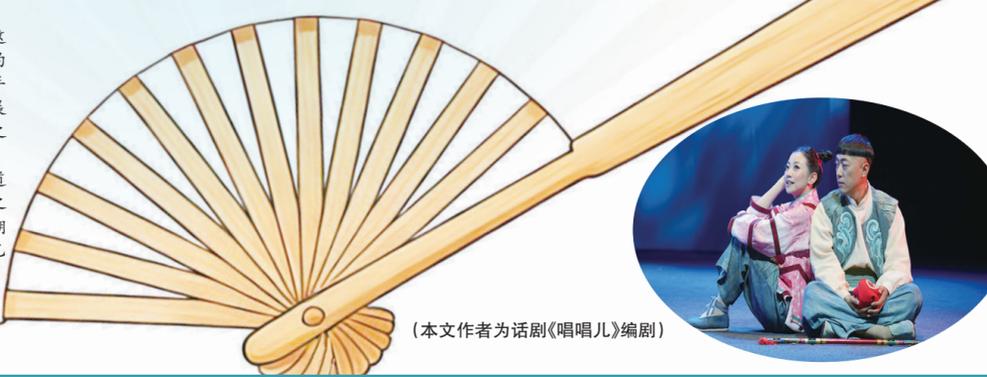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尊严。在流浪艺人被称为“下九流”的时代，社会不给的尊严，戏来给。戏里，他们可以是任何人，有一百一千万种活法，收获报酬，收获观众的笑泪与迷恋。那些悲欢与喝彩，与金钱一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。

所以《唱唱儿》的角色们，他们会一直走下去，唱下去，是艺人的本能，是江湖的宿命，更是对“唱唱儿”的信仰。他们经历的苦难是真实的，但快乐也是。他们受到的歧视与压迫是沉重的，但享受过的尊重与迷恋也是。苦与乐无法对等和置换，对他们而言，绝大多数时候，“活着”这件事本身，就要拼尽全力。世事凄凉，冷暖皆霜。怀新抱炭，大雪茫茫。一代又一代的“唱手”们从未放弃过。白山松水，他们行走四方，命如秋蝉，却将对艺术的追求与信仰做到极致，不怕饥寒生死，不怕孤寂凄凉——怕只怕，唱不尽，人间情长。这，就是我们的《唱唱儿》。

“唱唱儿”，二人转的旧称，重音在第二个字，一如“画儿”的读法。旧时持此业的演员，被称作“唱唱儿的”或“唱手”。“好唱手，江东走。”当年松花江畔的吉林，是东三省优秀唱手的竞技场，高手如云。“唱唱儿”的世界，是离了场子会被人唾弃，上了场子就奉为神明的世界。最低贱的最高贵，最贫穷的最富有，最痛苦的最快乐。与此同时，身处至低之处，诱惑想有多少，就有多少。付出未见比其他人少，要面对的考验只有更多。

话剧《唱唱儿》里的几代艺人们，一开始走上这条江湖路，多半都是别无选择，向死求生。生命的韧性于张力无穷无尽，在不能确认的未来里，唱手们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、较量、互助……无限拓展了生命的宽度，在人间生疏硬唱出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他们是“江湖人”，坚守着自己的修为、规矩、道义、志向，是东北黑土地上的一代宗师，行走田野之中，迷倒千千万万人。他们“人低戏不低”，于江湖之中，刻苦修炼绝技。唱说扮舞绝，样样都有自己



(本文作者为话剧《唱唱儿》编剧)